

二十世纪文库

日常接触

〔美〕戈夫曼 著
徐江敏等 译



华夏出版社

日常接触

IUI WENKU ·

〔美〕戈夫曼 著
徐江敏等 译

华夏出版社

1990年·北京

责任编辑：孙 枫

封面总体设计：郭 力 钮 初 呼 波
王大有 李 明

本书封面设计：呼 波

日 常 接 触

〔美〕欧文·戈夫曼 著

徐江敏 丁 晖 译

李姚军 校

*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 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9千字 插页2

1990年7月北京第1版 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册

ISBN7—80053—585—1/Z·064

定价：3.25元

译者前言

欧·戈夫曼 1922 年生于加拿大的曼维尔，1945 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而后在芝加哥大学学习，1949 年获硕士学位，1953 年获博士学位。这一期间，他曾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设得兰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屿上，收集有关那个社区的论文资料。1962 年他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1 年以后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1—1982 年出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坦普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的重要著作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日常接触》、《隔离场所》、《烙印》、《框架分析》、《谈话方式》等。

符号互动学派是社会学从欧洲移植到美国后，在美国土壤上产生的一个学派，它起源于意识流创始人詹姆士把自我分成主我与宾我，而后在芝加哥大学经库利发展成“镜中我”与托马斯的“情景定义”，后经米德与布鲁默进一步系统化。戈夫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先前的那些大师们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检验、补充并加以精细化，提出了自己在社会学方面的戏剧表演理论，用戏剧学的理论和概念解释日常生活，把符号互动论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对社会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正如美国一些评论家所说的，戈夫曼的著作对于人类的自身理解有显著的贡献，它精细地论述了社会情境中的人类行为以及我们在他人面前如何表现自己这一主题，《日常接触》一书也不例外。戈夫曼的人类行为模式假设说，问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真

“正”是什么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经常在表演。我们永远在舞台上，即使我们相信自己是最本能和最真诚地对他人进行反应时也是如此。这种假设是戈夫曼理论的出发点。

本书由两篇相互独立、却又密切关联的论文组成，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第一篇文章“游戏的乐趣”中，他进一步发展了“游戏”这一概念，并指出日常接触也是一种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人们平起平坐，一切外部的、功利性属性如财富、社会地位都不起什么作用，正如医生对病人的治疗、售货员对顾客的服务都不依对方社会经济地位为转移一样，社交日常接触与游戏也是如此。因而，人们觉得游戏是一种迷人的活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这是游戏的规则使然。这些规则象一层保护膜，也象一张网，不仅选择、抑制而且还改变、整饰要进入游戏的外部属性。在游戏中，外部属性要进入游戏往往须借助于一种颠倒的方式，于是出现角色颠倒的问题（如男人对妇女与小孩表现出尊敬），正因为这种形式与这种机制，才能使游戏产生乐趣。在第二篇文章“角色距离”中，戈夫曼超越了传统的角色理论，对角色距离的功能作了独到的分析。他强调个体角色的扮演与角色他人，特别是与角色丛有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角色形象往往并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地位赋予的，人们往往按地位的要求扮演角色。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扮演几个角色，同时也就有几个自我，因而就可能出现自我的“角色冲突”。在某种情境下，当个体对自己的角色不满时，就会对自己扮演的角色表现出某种轻视的分离行为，也就是说，他表现出角色距离。这种角色距离表现了一种反认同作用，也表现了个体与自己的地位相脱离的倾向，这往往是人们防御性的活动在起作用。在组织性活动中，角色距离也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它具有紧张管理、激励士气、消极制裁等功能。角色距离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中，因而也就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但一个情境活动系统只给个

体提供众多角色中的一个，这一角色在这一场合有重要意义，但其他许多次要角色也有意义。个体往往对这种组织安排的情境角色表现出距离，但又不完全背离它。

戈夫曼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人们日常交往中一些很具体的问题，颇有教人“为人处世”的意味，其实这是一种很微观的研究，我同来校讲学的专家谈起戈夫曼，他们都认为这种研究是一种很有意思又很专门的研究领域。戈夫曼的思想影响了一代社会学家。我们介绍此书的目的就是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西方社会学理论，给读者进一步了解生活、观察生活带来一定的启发，同时也使读者能进一步丰富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当然，戈夫曼的论述并不是很完善的，有些观点仍是不正确的，希望读者能用批判的眼光加以鉴别。

徐江敏 丁晖

1988年于南开大学

序　　言

对社会组织的每一个单位的研究都终将导致对其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分析。因而，组织单位与交往过程之间在分析上的区别是不会把我们的工作区分开来的。分工的不同似乎更可能来自对不同类型的单位、不同类型的要素、或不同类型的过程的区分。

在过去，社会学家仅仅把面对面的交往作为“集体行为”领域的一部分来研究；它所涉及的都是那些由于平常的社会交往产生破裂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单位，诸如人群、暴民、恐慌和暴乱，但面对面交往问题中的另一个方面，亦即有秩序的、平静的面对面交往得以产生的组织单位，却一直无人问津，直到最近才受到重视。当然，人们曾对课堂交往、交谈话题、委员会的会议以及公共集会等作过某些研究。

与把面对面的交往划分为变化多端和日常习惯的做法相反，我将提出一个不同的划分方法——非专注性的交往和专注性的交往。非专注性的交往是由那些仅仅因人们彼此在场而产生的个人交流构成的，例如站在同一房间两端的两个陌生人相互审视对方的衣着、姿势与总体风度，而各自又因为自己正受到注意，所以都在调整着自己的举止。而专注性交往则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实际上同意在某段时间内使其认知与视觉注意力集中于某一焦点，如在参与者组成一个面对面的小圈子而进行某项需要协作才能完成的任务时。当然，那些聚精会神地关注着某一事件的人也会使彼此进入非专注性的交往中。但他们是不会以专注性活动参

与者的身份来使彼此进入这种非专注性交往的。此外，那些彼此在场但并不参与专注性活动的人也同样会参与这种非专注性的交往。

本书的两篇论文研究的仅是专注性的交往。我把产生出专注性交往的社会组织的自然单位称为**专注性聚集**、**日常接触**或**情境活动系统**。我认为，这些自然单位的实例中存在着大量的共同因素，值得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类型进行研究。我选用了这三个不同的术语，不是因为它们是精心构思出来的，而是因为我无法找到更好的术语。我们在下文中将会发现，这三个术语中的每一个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术语也许在某些方面是令人满意的，但同时却使其他两个术语不能令人满意。这两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上论述了社会组织的这一单位。第一篇是“游戏中的乐趣”。这篇论文是通过对在桌子旁所做的游戏进行考察来探讨专注性聚集。第二篇是“角色距离”。它则通过对社会角色分析的回顾与评论来研究专注性聚集。

最近，群体精神疗法的研究，特别是“小群体分析”的研究，大大促进了对专注性聚集的研究。然而，我觉得，目前轻易把专注性聚集混同于社会群体的普遍倾向，使这一成果的充分应用受到了妨碍。^①因而，一个狭小而又使人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就这样被“社会群体”这个无所不包的标题弄得面目全非。有关这一定义性问题的一些引言性简评，可用来作为本书所考虑的社会组织单位的引论。

专注性聚集与群体确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甚至是一些必不可

^① 关于日常接触即为群体的有力论述，请参见 E.F. 博格塔与 L.S. 科特雷尔合著的“论群体分类”，载于《人际关系研究》，第 18 期（1955 年），第 416—418 页。

少的特征。如果人们要组成一个专注性聚集并在一起呆一段时间，那么就必须解决某些“制度问题”，如：参与者须服从吸收新成员的规定；遵守对公开表露敌意的限制并服从某种劳动分工。这些必不可少的条件也同样存在于社会群体之中。既然社会群体与专注性聚集都表现出相同类型的特征，那么，对社会组织的这两种单位进行区分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当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专注性聚集的参与者时，这样的区分难道不是太牵强附会了吗？

恰恰相反，在这两种单位之间发现其相似之处越容易，由于不加区别而造成的错误也就越多。那么就让我们来深究一下这个问题——群体与专注性聚集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群体的定义可以确定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特殊类型，其要素是这样一些个体：他们除了把社会组织视为参与者彼此间所具有的特殊关系外，还把它看作一个独特的集合体，一种社会实体；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彼此相属的成员，与社会组织产生认同，并从这种认同中获取道德上的支持，此外，他们对外部群体亦抱有一种敌对感。这里还涉及到对群体现实存在的以及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符号化。

根据这一群体概念，小群体可依据其起作用的范围大小来加以区别（虽然无此必要），例如成员间广泛的个人了解、普遍的见解一致以及对非正式角色分化的依赖。让我暂时把小群体称为“小型群体”，以便把它们与其他所有在小群体标题下研究的现象区别开来。小群体本身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是正式组织的还是非正式组织的；是长期存在的还是暂时存在的；是多层次联结的还是各据一方的；是相对独立的（如家庭或帮伙）还是存在于一个密切关联的组织结构中的（如军队中的班排或官僚派系）。

社会群体无论大小，都具有一些一般的组织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加入和退出群体的规则；共同行动的能力；包括领导角色在

内的劳动分工；社会化的功能（无论这种功能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以及周围社会中潜在的或明显的作用。然而，同样是这些特征也能在社会组织的许多其他形式中发现，诸如联结两个个体的社会关系；联结一群朋友、一个复杂的组织、一群商人或赌徒（尽管他们的公开目的仅仅是挫败其他参与者的企图，但却遵守着基本的规则）的关系网络。当然，我们可以把两个个体间的任何社会关系统统称为两人群体，但我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一个正在形成或濒于消亡的群体也许仅有两个成员，但我觉得，用于研究这个名不符实的群体的框架，理应有别于用来研究这两个个体间社会关系多面性的框架。此外，如果仅仅因为两个个体间存在一种社会关系就把他们称作一个“两人群体”，这就忽视了群体的特征，也不能探索出人际关系的与众不同的特性。

小型群体是不难发现的，尽管我们通常是在其自然背景下研究这些群体的，但我们仍可以为了研究的目的而构想出这样小型群体。^① 同意在一年内每周参加一次团体精神疗法的人，在这一年之内，很可能形成一个小型群体。如果把一群人聚集在一间观察室内，要求他们共同完成一项预先设计好的面对面的工作，时而告诉他们彼此间应如何配合，那么，这群人就很可能形成一种小型群体，尤其在进行一系列试验时更是如此。即使几个过路的陌生人在街上聚在一起闲聊了几句，并表现出希望维持有秩序的面对面交往的意愿，也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短暂的、无足轻重的“特种类型群体”。它没有受到其成员事先接触的影响，因为其成员之间以前并没有发生过任何接触；它也不会影响将来的交往，因为这种交往是不可能存在的。

^① 或许，对这一问题最著名的研究是马扎费·谢里夫与 C.W. 谢里夫合著的《和谐与紧张中的群体》（纽约·哈珀出版社，1953 年版）。

在实验室聚集和特种聚集这两种情况中，可以发现一幅有关小群体特征的、模糊不清的、不太全面的图象。然而，问题不在于这些资料作为小型群体生活的标本会表现出怎样的琐碎和局限，因为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所研究的实例对调查者来说总会是有用的。事实上，研究人员经常研究的是作为专注性交往之特征的过程，而不是群体本身。^①（一个仅能为小型群体提供极为有限的资料的实验室试验，仍然有可能为面对面交往的过程提供大量的资料。因而，我不赞成把自然研究和实验研究加以区分，但却赞成把处于自然条件下或实验条件下的群体与处于自然条件或实验条件下的聚集区别开来。）

给出这些定义之后，群体与日常接触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显然易见了。某些对于作为一个类型的专注性聚集或日常接触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性，对于作为一个类型的小型群体却显得不很重要。这些特性包括：窘迫、保持平衡、注意力集中的口头表达能力、遵守关于放弃或充当演说者角色的规则以及对空间位置的分配。此外，专注性聚集的一个关键性特征——参与者把自己的注意力持续不断地投放在正式的活动性焦点上——并不是一般社会群体的特性，因为，与日常接触不同，就绝大多数群体而言，即使其成员们彼此不聚集在一起时，它们仍然能继续存在。聚集仅仅是群体生活的一个阶段；相反，散伙则是一个特定的日常接触的终结，即使当

^① 汉斯·泽特本在“依从行为”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相似的论点。该文载于《行为社会学》，第2期（1957年），第179—201页，特别是183页。下面这段就是从第183页上摘引的：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绝大多数关于小群体的实验都是关于行为体系的实验。它们通常不是对复杂意义上的“社会群体”所做的试验，虽然社会学家常常在这一复杂意义上运用“社会群体”这一概念。

同样的交往模式和同样的参与者会在将来聚会时再次出现也是如此。最终，有许多聚集，例如，一群在娱乐场玩纸牌的陌生人，这些聚集虽然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交往过程，但只会形成极为淡薄的群体感。尽管用于研究小型群体和研究专注性聚集的资料都可能从同一种社会场所获得，上述的种种区分还是可行的。同样，尽管任何社会群体都能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其成员共同维持的聚集特征来加以描述，正如任何聚集都能按照其参与者的交叠的群体亲和性而加以描述的情形一样，这些区分也还是可行的。^①

在许多小型群体的生活中，当群体的全体成员并且只有其成员聚集在一起，共同维持一种情境活动系统或日常接触时，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举行会议、做游戏、讨论电影、一起抽烟休息等。把这些聚集称为“群体的聚会”，很容易使人误以为自己是在直接研究群体。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人们举行的聚会而已。即使这种聚会可能是因为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而召集起来的，但最初的资料却仅仅涉及到聚会中的参与者，而没有涉及到群体的成员。

的确，在这种场合，在群体生活的领域与面对面交往进程的领域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例如，小型群体的领导问题可能在成员聚集时由诸如谁是主席、谁说得最多、谁最经常地在讲话中被提到等问题表现出来。同样，聚集中表现出的领导倾向既可能影响到对群体领导的确立，又可能受已经确立的群体领导的影响。但是，群体领导不单纯是由各种聚集中占据的“地位平均数”构成的。事实上，群体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况：领导者有意让其他人在聚会时处于领导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领导能力就取决于他在群体成员聚集中能否巧妙地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

^① 我十分感谢哈南·塞尔文给我提的这个建议及其他许多建议。

色。群体领导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主持聚会”从本质上讲是聚集的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群体的一种可能性。

同样，小型群体中出现的派系可能与群体成员聚集时形成的联盟同时发生。然而，我们知道，这样“公开”表现出来的结构分裂可能被视为对群体的一种威胁，它是不利于群体在聚集时完成其使命的。所以，人们常常作出特别的努力，来避免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因而，聚集中的联盟往往与群体中的派系交叉存在。

此外，即使聚集的参与者都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即使这种聚集的召集又是为了处理与该群体相关的事情，我们仍然能不可避免地发现出席这种聚会的人也是其他社会群体的成员；而且，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仅能表现为一个亚群，即一个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亚群。聚集中的一些地位很可能是基于这些分化性的群体的亲和性而分配的。当然，聚集中的另一些地位则可能是依据非群体的亲和性的其他因素来分配的。这些因素包括：得到人们承认的经验、语言造诣、来到聚会场地的先后顺序或年龄的大小等等。

最后，虽然群体的士气及成员间的团结程度可能会随着聚集次数的增多而增加，但仍存在着一些很少召集全体成员参加专注性聚集的牢固的群体，以及多次召集这种聚会但其组织却很松散的脆弱的群体。

除了因作为群体成员与作为聚集参与者之间的不同而产生的问题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些问题。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些既明显地属于群体、又明显地属于聚集的特性，原来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中使用的抽象程度不同而产生的。例如，对聚集极为重要的一种领导形式，是维持交流场所的规定，即维持“秩序”。可是，领导形式的这一侧面在群体分析中却好象并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同样，无论在群体中还是在聚集体中，紧张管理都是必要的，但被管理的内容

在群体和聚集体中却是不同的。在日常接触中，每当正式的注意焦点受到各种使人精神涣散的事物威胁时，这种紧张就会随之产生。这种不安的情形可通过得体的行动加以管理。例如，用一种稳妥可行的方法坦率地指出是什么东西分散着人们的注意力。由此可见，在一些情形中，得体地表达出来的怨语能够疏通聚集中的交往，但却破坏了参与者碰巧所属的那个群体。

上面的辩论意在表明，尽管在群体的结构与群体成员组成的聚集性结构之间经常存在着实际上的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两个领域之间有任何恒定不变的分析性联系。为研究群体而规定的概念与为研究日常接触而规定的概念在分析上也许有一定的联系，但这些联系决不是不言自明的。

最后，我要指出，把小型群体与专注性聚集区别开来，不仅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一个聚集自身可能产生一个短暂的小型群体，而且还能使人们考察这一群体与可能来自日常接触的参与者的那些长期存在的群体之间的关系。

当一个小型群体的所有成员并且只有其成员聚集在一起时，这种聚集的作用才依其活动的结果而定，它将或多或少地加强或削弱这一小型群体。日常接触产生其特有群体的潜力似乎被用在它对长期存在的群体所发挥的作用上。通常的情况是，一个为期短暂的团结的圈子，似乎没有机会来更多地发展自身的牢固性，因为它同一个已经得到确立的模式是非常吻合的。可是，当不属于同一小型群体成员的个体聚集起来，尤其当他们彼此非常陌生、素昧平生时，日常接触所产生的群体形式必将与所有其他群体形成鲜明的对照，日常接触的参与者正是这些其他群体的成员。在这些情况下，即当参与聚集的人以前从未在某种群体中相遇过、而且以后也不太可能再相遇时，这种区域性产生的群体似乎投下了最为强烈的影子；还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组织单位的命运似乎息

息相关，聚集的效力相当直接地影响着群体的团结。

那么相反，如果一个聚集要自动形成一个群体，并使这种群体形成成为标志着该聚集的值得纪念的事件，那就得邀请一两位陌生人参加聚会——在社交场合，人们正是小心翼翼地这样做的。这些陌生人稳住了从这种聚集中形成的群体形式，使之不再漂回到参与者之间先前存在的那种关系和群体中去。



登记证号：(京)04

ISBN 7-80053-585-1/2-54

定价：3.25 元

C912.1

5356

《二十世纪文库》

第四批出版书目

*

文化进化论

〔美〕R·塞维斯

日常接触

—社会学交往方面的两个研究

〔美〕戈夫曼

危机中的福利国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

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

〔美〕P·切克兰德

文化与交流

〔英〕埃德蒙·利奇

人道主义哲学

〔美〕科利斯·拉蒙德

历史学家和数学

〔苏〕米罗诺夫

历史学方法论

〔波〕托波尔斯基